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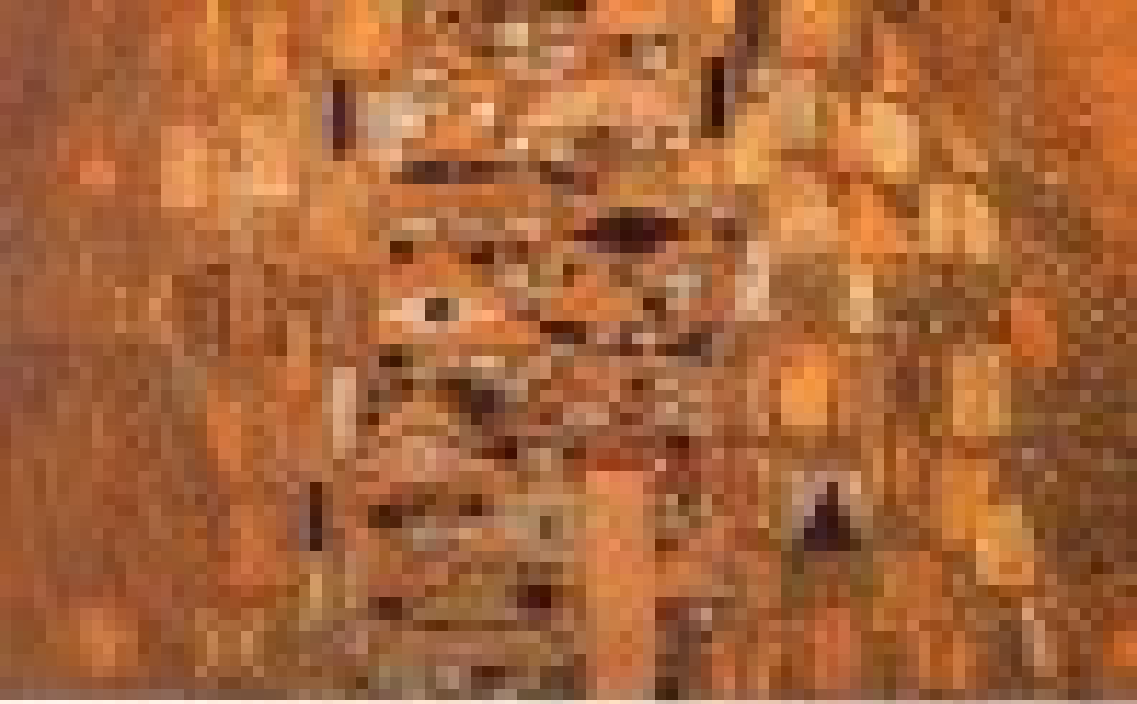
“文学场”之魂

——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

潘桂林◎著

W E N X U E C H A N G Z H I H U 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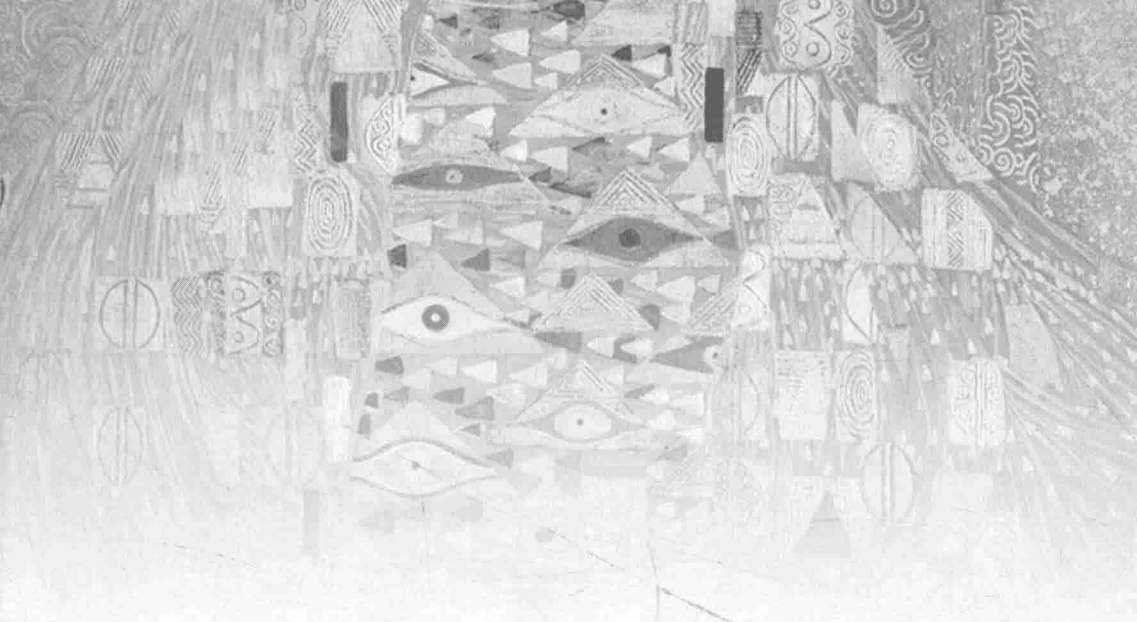
“文学场”之境

——中国近代短篇小说发展史研究

陈平原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 7-302-04211-9

An abstract, monochromatic geometric pattern occupies the top half of the cover. It features a dense arrangement of triangles, circles, and lines, with several stylized eyes or face-like shapes integrated into the design. The pattern has a textured, almost woven appearance.

“文学场”之魂

——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

WENXUECHANG ZHIHUN

潘桂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场”之魂: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潘桂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61-4263-9

I. ①文… II. ①潘…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790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成果，
获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怀化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资助**

自序

万事皆因缘。即便学问，也源于美丽的相遇。呈现于您面前的专著《“文学场”之魂——中国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研究》就是一场偶遇结出的青果。果实不大，不显眼，但从酝酿到成型，经历了十年有余的时间。我素来理性不足感性有余，倾心于重生命体验和审美领悟的诗性言说，对于理论分析心怀敬畏和惧怯。但2001年开始的硕士求学生涯，对我敞开了理论研究的魅力。

当时，导师赵炎秋先生要求我参与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叙事思想研究”，负责探索晚清小说叙事转型问题。我在各种抽去感性因素的叙事学术语中奔突，在林林总总的晚清小说文本和小说理论中浮沉，内心混乱，焦灼，但不敢退缩，也不愿轻言放弃。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撞击着我：读者意识是晚清小说转型的重要原因，它就像一只无形之手，操控着文体革新、雅俗之变和叙事声音。我揣着这个假想认真研读了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等著作，发现他们在理论上对读者建构文本的功能进行了可贵的阐释。我把阅读感受告诉了赵老师。他肯定了进入政治和商业语境，且以报刊为传播媒介的晚清小说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但是提醒我，最好能突破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研究的局限，必须将读者及读者意识与叙事转型问题联结起来，思考读者意识是怎样拉动小说从内容层面到语体和叙事层面的革新。

方向和切口的敲定，慢慢敞亮了茫茫迷途，线条渐渐浮现，明晰，坚实，搭建成我论文的基本框架。最后，我的毕业论文《读者意识与晚近小

说的雅俗流变及叙事革新》被评为湖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考入武汉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导师张荣翼先生为我们讲授文化研究，我的学术视野延伸至文化消费领域和布尔迪厄的“场”理论。“文学场”由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构成，不仅场内要素相互关联制衡，组构成一个动态的权力争夺空间，并与其他场域相互渗透，共同制约文学生产；文学场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学逐渐走向自主的过程，也是文学被权力控制但勇敢抵抗权力的过程。这些思想像一束光，出现在迷离幽深的洞穴，将所有浮游在我思绪中的亮点汇集。一种整合文学场内外诸要素的思路形成，文体革新、叙事转型、启蒙现代性、话语实践、传媒诗学等理论资源齐聚于近代新小说、文学场和读者意识三个关键词。我确定我的博士论文和近几年的学术研究都会围绕这个领域展开。

导师张荣翼先生眼光锐利，他果断指出了这一选题隐藏的危机，“读者意识”和“文学场”都具有深厚的理论意涵，将任何一方条分缕析都殊为不易，并建议我最好攻其一点，要么论述新小说文学场，要么剖析那一时段的读者问题，以免两个术语比翼齐飞，造成两组理论各自为攻，无法融汇。但我坚持了铤而走险的研究路径，我要做的工作不是单纯地描述近代新小说的文学场态和读者意识，而是要借助这一动荡变幻阶段的文学现象来描述文学场效能及其生产机制。本书的读者意识是作家心中的读者意识，它虽然不是文学场和文学存在的任何实体性要素，却是文学场和文学诸要素沟通的隐性中介，是场要素作用于文学创作的深层动力，也是作家调整创作方向和文学自我转换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

中国近代新小说生产是一场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多种要素参与完成的小说实验，革新的热望与怀旧的眷念交织渗透，使之像一场充满激情又满怀留恋，洋溢革命精神又深受传统桎梏因而焦灼痛苦的舞蹈一样，而读者意识就是这个文学生产场的精魂，是促使这次舞蹈产生并焦灼迷茫的内在根源。要理清这个复杂的问题，困难重重，但我拥有激情和韧性，也愿意用十年的冷静思索将一场学术的相遇演变为深情的拥抱。但本书毕竟还只是我融合多种理论资源，寻找文学场理论延伸点的大胆尝试，只是一次勇敢

历险结出的小小青果，不免稚嫩和酸涩，今天敢于付梓出版，是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前辈和朋友们的提点与批评，能够让它在学术的天地里早经受风雨阳光，以期有机会成长为一枚成熟甘甜的果子。

这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学术专著，我要借此机会对给予我帮助各位老师及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张荣翼先生的尖锐提醒和耐心指导，使我尽可能地避开理论建构和整体行文断笋的危险。感谢赵炎秋先生的果断指引和宽容鼓励，引领我走入学术大门，给予我前行的勇气。感谢张文初先生“让学术成为一种爱和享受”的箴言，让我的学术之路充满美和诗意。感谢颜翔林、李建中、冯黎明、唐铁惠等老师对我做出的积极评价，给了我自信和继续努力的激情。还有很多老师和朋友的提点都带给我可贵的启迪，在此一并感谢。

是为序。

潘桂林

2014年1月20日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读者意识在文学场中的联结功能	(13)
第一节 当代文学存在论对“读者”的关注	(13)
第二节 文学场的构成要素与功能	(28)
第三节 读者意识:场要素的联结核	(43)
第二章 近代文学场中的新小说读者意识	(53)
第一节 近代新小说生产的外部场域	(53)
第二节 近代新小说生产的文学场	(70)
第三节 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的特质	(94)
第三章 民族境遇意识引领新小说语体革命	(123)
第一节 语言在文学存在中的地位	(123)
第二节 近代新小说语体变革的意义	(130)
第三节 新小说的语体变革与雅俗流变	(141)
第四章 报刊语境意识拉动新小说叙事革新	(171)
第一节 近代新小说的报刊文化语境	(171)
第二节 近代新小说崇尚新奇的叙事特征	(181)

第三节 近代新小说的集锦化倾向	(193)
第五章 读写身份定位导致新小说反讽弱化	(208)
第一节 小说叙事声音的风格类型	(208)
第二节 新小说反讽弱化的总体趋势	(222)
第三节 读者意识:叙事的隐在控制者	(230)
结语	(240)
参考文献	(246)

绪 论

一 近代新小说的基本状况

就世界文学而言,“新小说”是20世纪具有强烈反传统意味的先锋写作,尤以60年代达到顶峰的法国新小说为标志,中国则主要指梁启超借助《新小说》杂志发起的“新小说”运动。中国新小说虽然无法与《狂人日记》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越过历史与文化现代性体验的障碍与法国新小说相遇,但这场运动在沉睡国民的视野里影响巨大,其革命性在中国当时的文学场中近似于乾坤大挪移。为了有效分析这场特殊的文学革命,我将在下面的介绍和论述中引入对比视角,并将之置于文学场视域,从读者意识切入文学生产,思考近代新小说转型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呈现。

陈平原指出,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基本上是由两代人完成的:第一代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为代表,以《新小说》的创刊为标志,响亮提出并实践“小说界革命”主张,他们创作出大批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作品,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亦有别于现代小说,时人称之为“新小说”;第二代以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以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为标志,正式开创了现代小说写作。他把活动于1898年至1916年的小说家称为“新小说家”,而把主要活动于1917年至1927年的小说家称为“五四小说家”。^①“新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韩南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新小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说出现在 1895 年，是傅兰雅组织抨击中国社会三弊的“时新小说”比赛后在香港出版的《熙朝快史》^①。本书则将新小说的起点定为 1902 年。该年 11 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亮出了“新小说”的口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文章从审美心理的角度论证了小说不仅“足以移人”，而且能“极其妙神其技”，具“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实乃“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以“熏”、“浸”、“刺”、“提”四种力概括了小说的影响力，并指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他对中国传统小说大加挞伐，认为小说乃“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其力不能避开，于是只能“用其善而避其恶”，并于文末宣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联结大众的报刊媒介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凭借其鼓动性、权威性迅速将影响力播撒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口号借助《新小说》杂志很快传遍中国小说界和舆论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近代新小说的纲领性文件，《新中国未来记》则是第一篇被正式命名的新小说。该杂志强调小说“开民智”、“祛旧俗”的实用社会功效和小说形式的通俗浅白、言文合一，是 1906 年停刊之前新小说发表的主要阵地。该刊于 1906 年停刊后，《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承接相似的办报主旨，使新小说以强劲的势头继续发展。

近代新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是以 19 世纪民族工业，尤其是新闻报刊业的

① 韩南指出，最早提倡并促使“新小说”产生的是傅兰雅 1895 年举办的“时新小说”竞赛，主题为抨击中国社会“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年底在香港出版的《熙朝快史》致力于表现根除三弊和官僚腐败，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现代小说。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 页。

② 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 年第 1 期。本段后面引号内引用出处与此相同。

发展为基础的。文学刊物和新闻报纸副刊是近现代文学的主要刊载场所，而小说是这些文学形式中最受欢迎的形式，所谓“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①。据阿英调查，最早的小说专刊就是《新小说》，其可观销路刺激了传播领域创办小说专刊的热情，“继有李伯元主编之《绣像小说》（1903）半月刊，共行72期。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老残游记》皆系发表于此。李伯元故后，吴趼人创《月月小说》（1906），行24期，自著有《两晋演义》、《劫余灰》等。《小说林》（1907）出最晚，行12期，载有曾朴之《孽海花》。这是主要的几种……”^②调查显示，在1902年至1917年的15年时间内创办的文艺期刊有57种，而以“小说”命名的杂志、报纸就有29种。^③当时的小说专刊是新小说主发阵地，综合性文学刊物和各类专业报刊也会刊载小说，“以助兴味而资多闻”^④，达到招徕读者扩大阅读群体以致增加发行量的目的。譬如，李涵秋的小说《雌蝶影》载于《时报》，《广陵潮》载于《公论报》，徐枕亚的《玉梨魂》发表于《民权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连载于《世界繁华报》。

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物质载体和通道，报刊媒介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存在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称那种通过报刊媒介进入传播领域，并充分考虑到报刊阅读语境的特殊性、阅读对象的阅读趣味、阅读效果和阅读范围的有限性，从而主动调整作品内容、形式以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的文学为报刊文学，近代新小说因此可以称作报章小说。报刊文学的优势是能够迅捷走向社会各阶层，劣势则是版面容量有限，因此，当时短篇小说盛行，而中长篇必须以时断时续的连载形式面世，这将引起小说结构和叙事话语的大调整。由于报刊传媒的发展，阅读大众的需求，大量职业作家的诞

① 摩西（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1907年第1期。

② 阿英（钱杏邨）：《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1页。这一统计并不包括有待进一步考证的以下几种报刊杂志：杨世骥《文苑谈往》中提到的《沪滨小说》和《小说智珠》；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提及的《小说图画报》；史和等《晚清浙江报刊录》提及的《宁波小说七日报》；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提及的《粤东小说林》。

④ 《时报·发刊词》，引自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生，中国近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大力吁求小说生产的文学场，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现实条件。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小说题材比较单一，多为才子佳人、英雄盗匪之类。近代原创与译介新小说则取材极为广泛，涉及科幻、政治、历史、近事、写情、官场、底层，世间众生相被多角度多侧面描绘，跃动的生活图景被立体地展开。由于报刊传播改变了读者群体，读者接受能力被充分考虑，以浅显白话为文成为当时小说革命的一面旗帜。这种白话与明清文人案头小说的白话又有不同。明清白话小说虽然文字浅近但用笔深隐含蓄，须具有相当审美感悟力之人方能领悟其内涵和神韵。近代白话小说追求真正的通俗，简单明白，文学的意蕴之美悄然流逝。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还提倡俗语和方言小说，以便最大限度地进行文化普及。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边缘位置使其创作具有更大的自由性，虽然功利文学观的影响也使小说包含“劝善惩恶”的道德追求，但相对于诗文而言，小说“言志”和“经国”的使命居于娱乐和审美之后。近代新小说倡导者意欲借助小说的浅近易懂走向民众，实现其救世新民的宏大目的，小说原本侧重的娱乐消闲性被压抑，教化和经世功能被极力张扬，从而成为意识形态宣扬的工具，小说地位迅速攀升，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总之，中国近代新小说走入了商业运作轨道，适逢政治激变语境，大批职业文人产生，创作热情高涨，作品数量激增，阅读群体和阅读趣味都趋于多样化，表现题材拓宽，文体革新和叙事方式有了重大发展，意识形态宣传效能被强化，它在多种力量争夺制衡的境遇中流露出革新的激情与转型的阵痛。身处场域激变中的新小说作家在启蒙新民和商业盈利的双重功利裹挟之中，萌生出强烈的读者意识，而读者意识恰恰能够整合文学场诸多要素，并进而对近代新小说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影响。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

为了理清课题所指范围，须对中国文学上的“近代”概念进行辨析。历史发展的衡量指标具有多重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都含纳在内，侧重点不同，历史分期亦有不同。当今学界毫无分歧地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分水岭，却对近代的终结即现代的开端问题

持有不同意见。1949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始和中国近代史的终结，但文学及文化演进与政治经济有关却不完全同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现代文化的起点略微妥当一些，因为这场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砸碎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锁链，在文化领域内将国民引入了反传统的现代性境遇中。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是全世界通行的一套话语命名方式。在中国现代以前的本土，时代命名是以朝代划分的，清代是其最后一个封建制王朝。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也是清王朝自身的一个分界线，中国历史1840年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间，被称为晚清。中国的近代文化则包括晚清到1919年之前的民国年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理清这些时间命名，而不直接用公历纪年法将其简单交代，是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全面地搜罗本书研究对象的前期成果。关于晚清小说、近代小说、清末民初^①小说，乃至鸳鸯蝴蝶派^②小说和“小说界革命”的研究，都属于我们关注的范围。

本书具体研读的原典范围包括近代1902年至1916年之间的新小说文本与相关理论。虽然第一篇新小说发表于1902年，但倡导以白话小说“使民开化”的第一篇标志性理论文章是1897年几道、别士发表在《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之后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饮冰室自由书》等文章也是新小说革命的舆论准备和理论阐述。这一阶段是中国小说空前繁荣的第一季，也是小说叙事由传统向现代勇敢突进和艰难转型的时期。1917年，中国小说界出现了自1902年以来少有的沉寂局面，理论界却亮出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之类的战斗檄文，将“新文学”主张推入了一个新高潮，一场比温和改良派更加猛烈彻底的理念转换风暴即将来临。1918年发表的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被认

① 中华民国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清末民初通常指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至1916年护法运动成功和袁世凯称帝失败这段时间。

②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到了“《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学界对游戏文“鸳鸯蝴蝶派”素来抱有鄙薄态度，曾受到钱玄同、茅盾、瞿秋白、郑振铎等人的批判。

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主题、文体和叙述方式上正式拉开了现代小说的帷幕，也宣告了近代新小说的结束。因此，本书研究范围包括1902年至1916年之间的新小说，理论和文化背景则可以回溯至19世纪末。

仔细阅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可以看出一条比较明显的趣味与风格转换印迹，即1912年开始，新小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我认同付建舟的观点，以此为界将新小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①之前倾心于对政治理想的乌托邦抒写、社会黑暗暴露和对庚子事变、华工禁约、立宪运动、种族革命等近事题材反映，思想立意上有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和救世追求，话语形式浅近易懂，多采用通俗白话。之后的小说转向了娱乐目的和哀情主题，还出现了骈文小说的短暂中兴。在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中，林纾的文言小说创作与翻译一直占据重要席位，短篇小说也颇受青睐。

二 近代新小说研究的主要路径

自近代新小说落潮到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间，鲁迅、胡适、陈子展、阿英等学者对晚清新小说的研究和探讨，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新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1920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对清之谴责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小说类型都有精到分析，在文学史方面具有开山意义；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晚清白话小说与古文对立评述，称之为“活文学”，乃“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30年代前后，陈子展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研究视野拓展到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苏曼殊的“古文小说”、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30年代后期，阿英《晚清小说史》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新小说的专著，他还广泛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晚清小说资料，为后期新小说研究提供了资料储备。

^① 付建舟：《小说界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由于近代新小说成就退之比不上明清，进之比不上现代，存在浅陋、粗糙、直白等审美不足问题，再加上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批评界意识形态话语独霸格局的存在，其地位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充分认识。1949 年以后大陆的晚清小说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停滞与论战（1949—1976）、拨乱与正本（1977 年至 1986）、突破与创新（1987 年至现在）。^① 1949—1976 年，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大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阿英整理出版了《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晚清文学丛钞》等重要资料。这一时期新小说研究大致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研究选题狭窄，主要局限于四大谴责小说；评价视角偏重思想性，忽略了艺术分析；论战火药味太浓，缺乏冷静中肯的学术商榷态度和规范的学术表述技巧；评价标准政治化倾向严重，体现了学术的政治喉舌功能。20 世纪 70 年代末，思想解冻，涌现出不少新成果，譬如，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近代文学史》、《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时萌的《曾朴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论稿》，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魏绍昌编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等。

总之，1986 年之前的近代新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搜集、文学史撰写、社会学视角的作家作品分析和思潮演进梳理，侧重于强调政治局势、经济状况、文化思潮、时代精神、具体社会历史事件，以及作家遭遇与身份等文本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属于文学的传记式研究、思想史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等范畴，即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外部研究”。譬如，阿英将新小说繁荣的原因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新闻业的发达，二是西洋文化的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②。他还直接将代表性篇目进行分类，认为《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是晚清社会的概观，《邻女语》、《恨海》、《新石头记》等是庚子事变的反映，《苦

① 何轩：《近百年来晚清新小说研究述评与反思》，《云梦学刊》2008 年第 1 期。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 页。